

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

Reformer or Dictator?

—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Chiang Ching-guo in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吳乃德*

Naitech Wu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一個社會在民主化之後仍然懷念過去的獨裁者，這並非臺灣特有的現象；可是對民主價值的培養，卻是一個頗不健康的現象。民眾和政治人物懷念蔣經國，學者則視他為臺灣民主的推動者。這樣的評價和回憶不但不符合歷史事實，更嚴重的是導致一項歷史遺忘，遺忘了人民在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角色；遺忘了在臺灣歷史的某一階段，臺灣民眾曾經基於他們的價值信念，共同完成一項重要的歷史變革。懷著這樣的歷史記憶，當適當的條件和時機來臨，價值信念或將再度成為推動臺灣社會進步的力量。

本文對實際統治臺灣數十年的蔣經國，做歷史和政治性的回憶：（一）蔣經國到底是怎樣的人，怎樣的一個獨裁者？（二）從蔣經國長久的政治生涯中判斷，他是不是真的如眾多學者所說的「民主主義者」？（三）蔣經國是不是真的如許多臺灣和美國的政治學者所說的，是「臺灣民主化的推動者」？如果他對臺灣民主有貢獻，他的貢獻是什麼？

本文指出：蔣經國和大多數的獨裁者一樣，缺乏文化素養、摧殘人權、不尊重生命。可是當形勢比人強的時候，他願意屈服。他的屈服，讓臺灣民主轉型得以在平靜的過程中完成。雖然他和現代型的獨裁者一樣，不重生活享受、隨時密切注意人民的反應，可是他從來就不是民主主義者。他對臺灣民主的貢獻，是他自動移開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獨裁。這是他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而且是唯一的貢獻。

Abstract

It seems to be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people in former authoritarian regime may hold a favorable memory toward their past dictator, even long after democracy has become an assured way of political life. While ordinary people and politicians in Taiwan remember the former dictator Chiang Ching-guo as a benevolent, competent and uncorrupted national leader, scholars and pundits praise him as the initiator of Taiwan's democracy. The latter evaluation not only contradicts the historical reality, it allows no place for the vital role played by the ordinary people, who, with their idealism and bravery, provided the backbone for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t is believed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this idealism on the part of common people would again play its role in the betterment of Taiwan's society.

This paper reassesses the role of Chiang Ching-guo in both the consolidation of dictatorial rule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 careful survey of his political career reveals that, as many other dictators of the world, his cultural taste and intellectual level was quite low. More importantly, he had low regard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He even showed little respect for human lives. He maintained the rule of "white terror" for several decades after he succeeded the throne from his father. He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crushing down the first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his father's rule. As the second wave of democratic movement emerged under his rule, he repressed the movement much more severely than his father did by imprisoning nearly all leaders and activists in the movement. A powerful dictator as he was, he nevertheless was willing to compromise when the environment required him to do so. Facing the strong demand for democracy from the people and the opposition in the last few years of his life, he did not resist the democratic reform for too long.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only contribution Chiang Ching-guo made to Taiwan's democracy was that he swiftly removed the only obstacle to democracy-his dictatorship.

Key words: Chiang Ching-guo,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dictator, dictatorship, historical memory

一般在學術會議發表的論文，作者通常會根據同行的評論加以修改後定稿。本文發表之後，在政治領域中和大眾傳播媒體上引起甚多的討論和批評。這些批評中有些和知識及歷史毫不相干，比較是屬於人格謀殺的行為，如宋楚瑜先生說，我撰寫本文是「爲了成名不惜幹掉國王」。國民黨說是總統選戰之前的政治陰謀，甚至是爲了求官。中國時報的社論則說，我寫的「學術爲政治服務，看了令人難過」。這種類型的批評雖然讓我們對臺灣政治人物和媒體的素質有更多的了解，基本上和文章內容無關。另外有些批評則和文章內容相關，爲了讓讀者判斷這些批評是否公正，我違反一般的慣例，將本文一字不改地重刊。因此我非常遺憾無法根據吳叡人教授在研討會上給我的精彩評論加以修改。不過，還是非常感謝他。

史達林完成了一樁人類史上從來沒有人可以做到的奇蹟：消滅了數百萬他的同胞，同時卻得到全體國人的崇拜。（某俄國作家，參見註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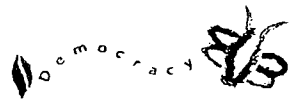
我們敬愛的蔣經國總統與世長辭，燒盡心頭血，點滴爲蒼黎。這位可敬的老人，他留給我們的不只是傷感和哀慟，而是那種「昊天罔極」的心靈至撼。一代人傑，千秋典範…不只是勇者行狀，更是仁者風範，智者襟懷！…我們也爲他哀傷，因爲我們都不夠盡力，遂使他必須如此自苦地耗盡生命最後一點火光。（《新新聞》社論 1988/1/18）

蔣經國真誠、樸實、平易近人，對百姓用心…這些人格特質及施政風格都能深深打動人心，而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馬英九）

〔蔣經國〕愛國家、愛人民、勤政廉能的情操，令人懷念。（連戰）

邱吉爾說，未來的歷史對他會很仁慈，因爲他自己要寫歷史。蔣經國雖然沒有自己寫歷史，歷史仍然對他非常仁慈。在本文撰寫期間適逢蔣經國過世十五週年。國民黨的領導人物熱烈地以音樂會、相片展來宣揚對他的歷史記憶。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 2003 年 7 月所做的一項電話調查訪問發現：46.2% 的受訪者同意「像解嚴之前蔣經國時代那樣的政治，對臺灣比較好」。

獨裁者蔣經國在生前似乎受到人民廣泛的愛戴、死後則受到長久的懷念，或許來自幾個原因。第一是他的統治期間正是臺灣經濟最繁榮、成長最



迅速的時期；臺灣在這個時期以其具備的優良條件（如工業基礎結構和教育普及等），有幸掌握了世界分工體系所提供的機會。而政治和社會秩序在獨裁統治和白色恐怖下也都井然有序。在他統治的大部分時間裡，政治改革者不得組織和動員，只能偶而在選舉活動和議會中發出微弱的抗議。其政策也不會遭遇群眾的抗議和示威。金錢的力量不敢跨越政治界線；黑道也不敢蠢動。雖然文化令人窒息、政治瀰漫恐怖氣氛，可是如果不計較公民的參政權和言論自由權、不計較心智的開拓、不計較公民的尊嚴，安分守己地做一個被統治者，那確實是一個不錯的時代。

另一個因素則是 Ronald Wintrobe 指出的，壓迫性愈強的獨裁者之所以能愈受到人民愛戴的主要原因是，所有不利於獨裁者和其施政的負面訊息都禁止公開傳播。¹ 在嚴格的媒體控制下，人民無法得知特權階級因政治保護和壟斷所獲得的龐大經濟利益。所有關於獨裁者個人和其政策的公開報導都是正面的。這也是為何發生在蔣經國統治期間的重大政治案件，如林義雄家庭滅門血案、江南命案等，都似乎和蔣經國無關；也是為何連戰會說蔣經國「愛人民」的原因。這或許也部分解釋了為何臺灣的政治學者都傾向認為蔣經國是一個「民主改革者」。

第三個原因則是，曾經受蔣經國提攜的政治人物，如今都仍活躍於政壇。而且主導輿論的臺灣兩大媒體的負責人，都和蔣經國有密切的關係，且曾經身為統治核心國民黨中常會的成員。其事業之所以有今天的規模，也泰半得利於威權時期報禁所造成的壟斷。今日國民黨和親民黨的領導階層，以及主流媒體都可說是昔日威權體制的一員。因此，他們不可能呈現蔣經國威權獨裁的面向。畢竟，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現在和未來。對「過去」的呈現方式，對「現在」有巨大的影響。這也是面對過去，為何有些政治人物希望遺忘，有些希望回憶，另外有些則希望加以扭曲。

本文的目的在對蔣經國作歷史的、和政治性的回憶。蔣經國曾經是統治臺灣數十年的最高政治領袖。我們應以何種歷史眼光來評價自稱是「獨立媒

1 Ronald Wintrob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37.

體」所稱呼的「一代人傑、千秋典範」、智仁勇俱備的蔣經國？他到底是壓迫人民的獨裁者，還是臺灣民主的推動者？他曾經逮捕、拘禁、處死許多政治反對者，曾經壓迫臺灣的民主運動，這些都是事實。臺灣的民主改革在他的容許下完成，這也是事實。面對這兩個似乎互相衝突的事實，我們應如何評估蔣經國在臺灣歷史上的地位？

研究臺灣的政治發展無法忽略蔣經國。雖然他在1969年才出任行政院副院長、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可是在蔣介石從1950年代開始不太過問政事之後，他就已經掌握甚大的權力了。² 尤其他在國民黨遷臺初期就掌握「政治行動委員會」，³ 50年代中期更出任「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國家安全局」前身），成為臺灣所有情報、安全、特務系統的總掌。⁴ 直到1988年蔣經國在總統任上過世為止，近四十年間他都是臺灣政治的實際統治者。然而對這一個統治臺灣如此之久的人，我們所知卻非常有限。他到底是怎樣一個政治人物？我們怎樣看待影響臺灣政治這樣久、這樣巨大的人物？

尤其重要的是，當我們解釋臺灣民主化的時候，蔣經國這個因素到底應該放在什麼樣的理論位置？他到底是壓制臺灣政治數十年的獨裁者，還是如他的許多從屬舊部、以及更多研究臺灣政治的學者所說的，是民主政治的推手，因此應將臺灣的民主化歸功於他？蔣經國過世的時候，眾多學者對蔣經國的歷史評價，幾乎完全一致地集中於他對臺灣民主改革的貢獻。高英茂說，「蔣總統對民主政治的貢獻是無可抹滅的。」張旭成說，「經國先生是一位非常有魄力、有遠見的政治領袖。他能在一個非常權威化的政治制度中帶動改革，帶動民主化…他必然將在歷史上留下崇高的地位。」（《中國時報》1988/1/14） 遼耀東說，蔣經國「無愧為中華民族的民主英雄」；林毓生也說，「蔣經國在歷史上的地位，無過於推動民主的改革」。（《聯合報》1988/1/14） 余英時則寫道，「經國先生近數年來全力領導民主改革，他已成

2 陶涵(Jay Taylor)，《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林添貴譯（台北：時報出版社，2000），244。

3 漆高儒，《蔣經國評傳》（台北：正中書局，1997），117。

4 龍中天，《蔣經國浮雕》（台北：群倫出版社，1985），100。

為中國民主前途的象徵。」⁵ 許倬雲寫道，「經國先生一生公忠體國，不避謗怨…其功業中最有長遠影響的，當然是政治民主化。」⁶ 金耀基更以悲痛感性的語氣寫道，「我相信，他自己一定是以無限關懷的心情離開人間的。他這幾年來，一直以帶病之身，為國事憂勞，幾乎已經到了有國無家，有國無己的地步…在民主政治發展方面，他更是為中國現代化最難的一關，做出了突破性的建設，使臺灣邁入了中國歷史上新的境界。」⁷（上面所引述的，都是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學者，有些甚至活躍於民進黨、及民進黨的政府中。）

數年後，當臺灣民主轉型成為學術界的熱門題目，許多研究臺灣政治的本國和外國學者對臺灣民主化的解釋中，最共同的地方是強調蔣經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學者的觀點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蔣經國在一般民眾中廣受歡迎的現象。一般民眾對蔣經國的擁護是「現代獨裁制」的一部份。較難理解的是，學者們在肯定蔣經國改革威權體制的同時，幾乎全部忘記蔣經國本人正是威權體制中權力至高無上的獨裁統治者，同時也忘記了就在他「推動民主化」的數年之前，還下令逮捕民主運動中所有的領導人物，並判予重刑。民主化之後，臺灣政治學和臺灣歷史學因此產生完全對立的狀況。臺灣歷史學者在民主化之後最大的收穫之一是，累積了甚多蔣經國統治下的政治案件史料和被壓迫者的親身經驗口述。歷史工作者所累積的豐富資料，和政治學者的論斷和評價，竟然有如此大的衝突和矛盾。這應該是臺灣學術界特有的現象，或許也是獨裁統治的部分遺產。

如何解釋臺灣民主化，不只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更是一個重要的、有前瞻意義的政治問題。在「第三波的民主化」中，「轉型正義」的難題是所有新興民主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⁸ 所謂轉型正義就是如何處理威權體制的遺產：如何對待壓迫者、以及其共謀者/協力者；如何處理政治壓迫的受

5 余英時，「以建立民主的新秩序告慰經國先生」，《中國時報》1988/1/15。

6 許倬雲，「新的定位，新的方向」，《聯合報》1988/1/14。

7 金耀基，「民主的遺產，歷史的巨獻」，《聯合報》1988/1/14。

8 N. J. Kritz, ed., *Transitional Justice*, vol. 1-3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5).

難者。⁹ 有些社會選擇不加以處理（如西班牙），有些社會則試圖以道德的、而非法律的方式加以處理（如南非）。臺灣則只有處理受難者，而對加害者無論在法律上、道德上、或政治上都不做任何的追訴，對蔣經國尤其如此。其原因當然是上述所言及的，追隨蔣經國的人如今都仍然活躍於政壇和媒體。

可是片面和偏頗的歷史回憶，對形塑未來的民主價值毫無助益。認為蔣經國是臺灣民主化的推動者，這樣的評價不只是不符合歷史事實。更重要的是，此種錯誤的論斷抹滅了民間自發力量的貢獻。而這樣的力量正是未來臺灣政治往上提昇的重要動力。「在臺灣歷史的某一階段，臺灣民眾曾經基於他們的價值信念，共同完成一個重要的歷史變革…了解理念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曾經有過的成就，卻是無比重要的。了解理念在人類歷史上、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曾經如何地促成社會的進步，讓我們對自己、對未來不致失去信心。借用捷克總統 Havel 描述其國家民主革命的話：『那個階段顯現了蟄眠於我們社會中巨大的人道的、道德的、精神的潛力。』當合適的歷史時機來到，價值信念仍將再度成為推動臺灣社會進步的力量。」¹⁰ 這是我們必須還原蔣經國的真實歷史面目的最重要理由。

廣受愛戴的現代獨裁者

人類受獨裁統治遠比生活在民主體制中久遠。民主成為世界的政治主流只是最近二、三十年間的事。可是對獨裁政治的研究卻不多。雖然歷史上許多偉大的政治思想家都曾經對獨裁統治或多或少加以關心，¹¹ 可是政治學者對獨裁政治的研究，並不若其他題目那樣豐富而有系統。獨裁政治因何產

9 Jon Elster,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Justice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9(1998):7-48.

10 吳乃德，「價值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與台灣民主化」，*台灣政治學刊* 第4期(2000):95-96.

11 對亞里斯多德、馬基雅維利、孟德斯鳩等思想家對獨裁統治的討論，請參見 Roger Boesche, *Theories of Tyranny: from Plato to Arendt*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生？如何維持穩定？獨裁者、或獨裁政權透過何種機制施行控制和壓制？更重要的，獨裁政治對社會生活和人民的道德造成何種傷害？在何種情境下它可能崩潰？對這些重要的問題我們都缺乏有系統的研究。特別是當我們想到二十世紀是人類史上最悲慘的世紀時，政治學這項疏忽顯得特別值得反省。二十世紀政治的常態是獨裁統治，甚至西歐的中心區域（德國、義大利、奧地利）和邊陲地區（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都受到獨裁政治的籠罩。人類史上最壓迫性的獨裁政權也都發生在二十世紀。如果不計因戰爭中而死亡的人數，死於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如希特勒、史達林、波帕、毛澤東、皮諾契）手中的人數，應遠遠超過死於人類歷上所有獨裁者的人民之總數。這些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似乎一致同意史達林的名言，「死亡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把人消滅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可是政治學的研究和教學，卻一向很少認真有系統地處理獨裁制、壓迫性的權威和權力、順服和反抗等重要的政治現象。

我過去對臺灣威權政體的研究，只是其中一個面向。我的關心限於威權獨裁的鞏固。獨裁統治的鞏固當然涉及其他許多面向，如媒體的控制、對反對者的壓制等，可是我的關注比較集中於獨裁政權如何透過「恩庇」和物質利益的分配，在本土的地方政治人物和一般人民當中創造政治支持。¹² 這個研究引發了臺灣社會科學者對地方派系的高度興趣。事實上，這種群眾性支持的創造是當代的「現代獨裁制」有別於「傳統獨裁制」的重要特徵之一。民主化已經十多年的今天，我們仍然感受到此種「現代獨裁現象」對臺灣政治的影響。

一直到近代之前，人類大多數時間是在獨裁制的統治之下。可是於第一次大戰後出現於歐洲、第二次大戰後出現於開發中國家的獨裁者，和傳統的獨裁者相較，卻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的獨裁者追求個人、及其跟隨者的財富。不論他們的權力來源是什麼，他們比較像傳統的帝王。他們關心的比較是如何累積個人和追隨者的財富，而非人民的支持。他們不太在意、甚至完

12 Wu Naiteh,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全忽視人民的生活和願望。他們用壓迫的方式保持權力。他們用處罰來恐嚇人民；因此他們為人民所怨恨。菲律賓的馬可仕、尼加拉瓜的蘇慕薩、伊朗的巴勒維是傳統獨裁制在現代社會中幾個倖存的例子。以蘇慕薩為例，父子兩代的統治為其家族累積了尼加拉瓜五分之一的可耕地、26個全國最大的企業、獨佔的航空公司、以及酒和汽車的獨家進口權。¹³

現代型獨裁者卻非如此。現代型的獨裁者雖偶而也追求個人及隨從的財富，而且也永遠藉政治壓迫來維持權力，可是他們卻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他們用各種方式創造人民普遍性的支持。對傳統的獨裁者而言，人民只是壓迫和壓榨的對象。對現代的獨裁者而言，民之所欲，常在其心。他們其實非常在意人民的期望，而且在可能也盡可能地加以滿足，只要這個期望不包括自由和民主。傳統的獨裁者希望人民因恐懼而服從，現代的獨裁者迫切希望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¹⁴

利用官方所控制的媒體和教育機構來宣傳領袖崇拜運動，是現代獨裁者用來創造群眾支持的重要工具。希特勒曾經驕傲地說，「如果我的反對者宣稱『我絕不會站到你這一邊』，我會冷冷地回答，『你的小孩早就是我們的了』」。¹⁵ 在臺灣的威權時期生活過的人，對中小學教育中和媒體中的領袖崇拜宣傳應該記憶猶新。以下的文字是當時領袖崇拜運動在官方宣傳中的主題：

領袖實在是我們國家生命和民族精神的融合體，是我們五千年歷史文化的繼承者，是我們革命集團的向心力；他的事業就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他的言論就是全體國民的內心的呼聲…人民離開他，就好像幼兒失掉了父母，國家離開他，就好像宇宙失掉了太陽；中國一日不可無領袖…¹⁶

13 Clive Pont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99), 337.

14 Barry Rubin, *Modern Dictators: Third World Coup Makers, Strongmen, and Populist Tyrant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7).

15 Stephen J. Lee, *The European Dictatorships, 1918-1945* (London: Routledge, 1987), 170.

16 蔣經國，《勝利之路》，(台北：正中書局，1978)，272.

說這段話的是民族救星的兒子，即將接班成爲廣受愛戴的獨裁者的蔣經國。他接班後，這樣的領袖崇拜運動當然沒有停止，只是對象有所更換、主題有所更動。

領袖崇拜運動的功效到底如何？一般的知識份子因爲推己及人而容易產生兩種看法。第一，這種荒唐的宣傳運動完全無效；它只是在滿足獨裁者的自戀、及跟隨者的諂媚。第二，它即使有效，也只是對知識較低、無批判力的一般民眾有效。事實上，這兩種看法似乎都不正確。官方的領袖崇拜運動不只非常有效，而且對一般人和知識份子同樣有效。從領袖（不論是史達林、毛澤東、還是蔣介石）過世之後人民的哀傷反映，應可以正確評斷其效果。我個人和民族救星有兩次親身遭遇，兩次都讓我對領袖崇拜運動的效果感到震驚。第一次是在成功嶺上接受民族救星的檢閱：領袖步行走過每一個連隊接受致敬，我們和領袖僅隔數尺之遙。解散之後，許多人竟激動得痛哭流涕、久久無法自己。第二次和最高領袖的遭遇則是在他「崩殂」的時候。每一個部隊都奉命擺設靈堂。在我服役的金門砲兵陣地，靈堂就設在我全天候看守的指揮所。接連數週我看著許多官兵、高教育的和低教育的，自動自發地在領袖的靈位前虔誠恭敬地上香膜拜，有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甚至一天數回。和領袖的第一次遭遇，我正準備要進入政治系就讀；第二次遭遇則剛從政治系畢業。這兩次遭遇都讓我因獨裁政治對人類心智的殘害，而對它產生無比的嫌惡。

領袖崇拜運動的效果並非僅及於一般民眾。不論是在臺灣或其他國家的獨裁制下，我們都看到許多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對獨裁者公開表示其愛戴之情。是因爲諂媚，還是衷心崇拜，或只是投一般民眾的喜好？這個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清楚的答案。可是有一些例子顯示：知識份子對獨裁者的衷心愛戴是可能的。史達林統治下的蘇俄，其領袖崇拜的運動被施展到極致。人民從進入幼稚園就開始接受史達林宣傳的教化；其後在每一個人生階段、每一個資訊來源、社會每一個角落都不斷地重複這樣的教化。更恐怖的是，當人民接收到官方宣傳的時候，並不覺得那是宣傳。史達林領袖崇拜運動所造成的效果是，他70歲生日的時候，民間寄到《火星報》的賀文多到需要三年的時間才能出版完畢。¹⁷不只是平民，許多正直的知識份子對史達林也懷有真切

的愛戴之情。蘇俄最堅強、廣受世人尊敬的抗議份子物理學家沙卡洛夫前幾年在其自傳中就坦陳，他早年其實非常景仰史達林。沙卡洛夫並不是特例。以下是發生在莫斯科的真實故事。兩個老朋友在紅色恐怖的最高峰時期於街上相遇；談到國事，結論是「唉，如果有人能告訴史達林這些事情就好了。」這並非笑話，對話者也非一般人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那克（Boris Pasternak）和當時已在西歐生活過數年的著名作家厄崙堡（Ilya Ehrenberg）。正如俄國一位作家所說的，「史達林完成了一項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可以做到的奇蹟：消滅了數百萬他的同胞，同時得到全體國人的崇拜。」¹⁸ 如果連史達林都可以獲得人民的廣泛愛戴，那麼蔣經國可以得到人民和知識份子的廣泛支持就不那麼令人訝異了。

官方的領袖崇拜運動並非創造群眾支持的唯一工具。現代獨裁者之能獲得民眾的普遍支持，另外的重要因素是現代化、以及附帶的社會經濟政策的推動，如土地改革、教育普及、甚至所得的提高和就業的創造。如果這些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措施獲得成功，如臺灣的例子，則獨裁者的權力和地位幾乎難以動搖。因為在獨裁制下，反對者和潛在的競爭者被壓制、所有的社會組織（如工會和學術團體等）被控制而無法發聲、更無法形成集體力量。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成功的獨裁者幾乎完全無法取代。此種民眾以「物質條件為基礎而給予的同意」（material base of consent），是現代型獨裁者獲得統治合法性的最重要原因。¹⁹

現代型獨裁者因為推動現代化而獲得的支持，也擴散及於知識份子。在現代化、有時是反帝國主義政綱的籠罩下，知識份子經常輕易地原諒獨裁者對他們的壓制、拘禁、甚至侮辱。一位在納塞統治下的埃及作家如此形容他們的處境：「納塞點燃我們長久以來的希望、哪怕只是短暫的閃爍，我們也因此著魔。他用成就和榮耀的醇酒來毒化我們；我們因爛醉而失去健全的意

17 S. J. Lee, *The European Dictatorships*, 85.

18 Martin Amis, *Koba the Dread: Laughter and the Twenty Million*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2), 213-14.

19 Jan Pakulski, "Legitimacy and Mass Compliance: Reflections on Max Weber and Soviet-type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16(Jan. 1986):33-56.

識……知識份子除了和納塞站在一起外，既無能力也無其他方式。因為多年來，他已經剝奪了我們的獨立思想和堅強人格。除了他的人格外，我們沒有其他的人格。」²⁰ 如果獨裁者努力推行現代化，而且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同時將腐化控制在可忍受的範圍內，並且也因此獲得廣泛的支持，知識份子既被解除了集體行動的武裝，其批判獨裁的聲音不太可能有太大的效果和迴響。同時，由於獨裁者對知識份子經常提供名望和地位的引誘，更多的知識份子會和獲得人民廣泛支持的獨裁者站在同一邊。臺灣和其他成功現代化的開發中國家，在這個現象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蔣經國這個人

在現代社會中的獨裁者到底具備什麼樣的人格特質？這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值得我們做歷史的反省。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透過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對人類的政治處境將有更深的理解。而另一方面，獨裁者的心理和個性經常也決定了他個人以及他所統治的國家的發展軌跡。馬可仕剛成為總統不久以後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我是總統。我是菲律賓最有權勢的人。我已經獲得我夢想的所有東西。

更正確地說，所有我生命中須要的物质條件我都已經滿足——一個愛我的太太、同時也是我的事業伙伴，將繼承我姓名的聰明的兒女，以及一個好過的生活——所有的我都有了。

可是我感到不滿足。²¹

正是這樣不滿足的心理改變了馬可仕後來的命運，也改變了菲律賓的歷

20 Rubin, *Modern Dictators*, 73.

21 William C. Rempel, *Delusions of a Dictator: the Mind of Marcos as Revealed in His Secret Di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93), xv.

史。蔣經國成爲獨裁者的過程，有異於大多數的獨裁者，並非來自自己的奮鬥，而是繼承自獨裁者父親。了解他的爲人不一定有助於我們了解我們在臺灣政治中的處境。不過無法否認的是，不論從人民愛戴的角度、或其政治遺產的角度加以評估，蔣經國都是一個成功的獨裁者。他的爲人仍然是臺灣政治史的一部份。

雖然蔣經國統治臺灣近四十年，可是相較於其他的獨裁者，他的真實面貌很少被了解。在獨裁政治中，資訊被嚴格管制，最高統治者的真實面貌和人格特質幾乎完全無法得知。其負面的行爲和缺點，更是難以顯露。而由於獨裁者的權力來源缺乏民主的合法性，利用領袖崇拜的宣傳來創造政治支持乃成爲獨裁政治的重要工作。在密集和精緻的宣傳之下，獨裁者的真正面貌和特質必然距離真實頗爲遙遠。甚至獨裁者的日記，都是爲了政治宣傳。由於蔣經國過去的追隨者目前都仍活躍於政壇，蔣經國的真實面目更可能受到掩飾。蔣經國過世後出現許多回憶文章及傳記作品。這些大量著作所提供的資訊其實非常有限。其中多數是緬懷敘述者所曾經追隨過的偉人。由於其追隨者目前都仍在政治中活躍，由於政治上的須要他們必須給蔣經國極正面的評價，他們的描述因此必然有很大程度的偏頗。另外雖有少數著作提供客觀的平面描繪，可是卻缺乏人性的縱深。對蔣經國這個人，我們從這些大量的傳記和回憶所得到的認識，並沒有超出我們日常從傳播媒體上所獲得的資訊。

從目前已有的大量的回憶、傳記和蔣經國自己的文字記錄中，我們對蔣經國這個人獲得幾個印象。我們獲得的第一個最顯著的印象是，和其他大多數的獨裁者一樣，蔣經國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非常平庸。民主政體所產生的政治領袖文化水平有高有低，可是現代世界的獨裁政體幾乎沒有生產過像林肯、羅斯福、邱吉爾那種氣質的領袖。一個人閱讀的書籍反映出他的文化和知識水平。蔣經國似乎是一個從不讀書的人，至少從不閱讀嚴肅的作品。蔣介石過世之後，他發表該年（1975）一整年的日記《難忘的一年》。²² 這本日記顯示，他在這一整年中沒讀過一本書。如果他有讀書的話，是不可能

22 台北：正中書局，1980。

漏記的。因為該日記幾乎是鉅細靡遺，甚至有一則（9月25日）說，「滿身大汗，買了一大瓶汽水，一飲而盡，由此可知水對身體的重要了。」（此種小學生似的感言令人訝異其思想水平。）除了來臺灣之前或許讀過古書王陽明之外，他似乎沒有閱讀當代較嚴肅的作品，無論是人文還是社會科學的著作。他的一些言論和著作顯示，他最喜歡、最精讀的書是他父親推薦的傳教書籍《荒漠甘泉》。因此，雖然他的演講和文章喜歡引用別人的話，可是卻幾乎從來沒有引用過嚴肅的作品。他最常引用的還是《荒漠甘泉》以及他父親的著作和言論。

最足以顯示蔣經國不讀書的，應是另外一本專門記載他每天閱讀記錄的《勝利之路》。這本書號稱是蔣經國「自己讀書的心得…每一天寫一篇」。蔣經國這一整年的閱讀記錄顯示，他在這一年間也同樣從沒有讀過任何一本嚴肅的著作。該書所有的引言幾乎全部來自「領袖」和「國父」所說的話。除了自己不讀書外，更恐怖的是：在一則題目為〈擇書精讀〉的讀書記錄中，他寫道：

書店裡成千上萬的書，並不是每本書都要讀的。我們只能選擇最需要最有用的書來看…那麼我們唸什麼書呢？國父和領袖的學問融貫中西，我們如果能將國父遺教領袖訓詞詳細閱讀，反覆研究，則一生足夠研究，儘夠應用了。²³

只要閱讀國父遺教和領袖訓詞，一生就足夠用了！這是多麼恐怖的想法。幸好蔣經國並沒有利用他最高無上的權力強行推銷這個想法，幸好蔣經國的這本閱讀記錄沒有成為高中學生的必讀書籍，否則臺灣的文化勢將停滯整個世代，國民的知識水平勢將更遠離文明社會最起碼的要求。

蔣經國這本閱讀記錄，除了只引用領袖和國父的言論之外，也有不少中國古代的歷史故事。可是這些故事都是以現代語文敘述，而且全都沒有註明出處。或許這是別人捉刀代寫的著作，而非蔣經國自己的閱讀記錄。不過即使是由別人捉刀，仍然反映出蔣經國的文化水平，或至少反映出整個統治核

23 蔣經國，《勝利之路》，71-71.

心的文化水平。如果蔣經國是一個有閱讀習慣的人，他必然會在這樣的宣傳品中要求他的捉刀者列入他喜歡的書籍、以和國民分享。可是不論是《難忘的一年》或是《勝利之路》，都沒有任何這樣的紀錄。

在一篇少見的給予蔣經國較為「平衡」評價的文章中，一位政治觀察家也提到了統治圈素質的低落。作者的解釋是，「大樹旁邊長不出樹來，強人旁邊也產生不了有擔當的幹才。」²⁴ 我卻比較傾向於接受「物以類聚說」。領導者的強勢權威和作風固然會影響團隊成員的決策能力和團隊的決策風格，可是決策能力和文化素質基本上是不相干的。我不相信一個平庸的領導者可以長期吸引卓越的追隨者。最基本的原因是：平庸的領導者缺乏正確判斷追隨者素質的能力。我也不相信，一個卓越的領導者可以長期忍受平庸的追隨者。

不只統治團體的能力物以類聚，在品格上也似乎是物以類聚。第一代的社會學家索羅金（P. A. Sorokin）曾經當過俄國二月革命後短命自由派政府總理克倫斯基的秘書。或許因為受到俄國共產黨領導者品格低劣所刺激，他曾經試圖了解統治者的道德特徵。在廣泛研究過歷史上許多的君主和統治者之後，他得到的結論是：統治團體成員的道德以當時他們所統治的社會之標準而言，都遠比被他們統治的子民更為低劣、充滿更多罪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社會選擇」，也就是物以類聚。由於統治團體充滿了品格低下的人，「相較於那些冷酷、沒有同情心、自私、偽善、不誠實、並且善於操縱人際關係的人，對道德比較敏感、比較有同情心、比較誠實、以及比較不自私的人，很少有機會能在權位的階梯上爬到最高層。」²⁵ 這是一種「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的社會過程。新生民主政權經常面對如何處理獨裁政權之幫兇的問題。為獨裁政權服務過的人經常會說，他們只是接受命令、毫無選擇，因此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不應負責。可是一位研究獨裁制的學者卻認為這根本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獨裁政權通常有「自我選擇」的過程；能

24 蔣良任，「蔣總統留下的遺產」，《新新聞週刊》1988/1/18-24。

25 Pitirim A. Sorokin and Walter A. Laudén, *Power and Morality*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59), 45-46.

爬到最高位的人通常是道德上最糟糕的人。²⁶ 也就是說，整個獨裁統治團體根本就是一群相類似的人。在道德責任上追究誰發號施令、誰接受指令，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蔣經國身邊人物的諸多回憶，不論是跟隨者、護衛、還是政治伙伴，都同樣不曾記載蔣經國喜歡哪些作品，甚至沒有提到他曾經閱讀過哪些嚴肅著作。例如克萊恩的《我所知道的蔣經國》一書。²⁷ 克萊恩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辦事處主任。由於職務的關係，和蔣經國有過數年的親密交往。他的妻子則是蔣經國的英文家教。克萊恩和蔣經國不但常因為公務接觸，餘暇也經常玩在一起，飲酒作樂。雙方的關係長達三十年。如果蔣經國因為隨從和跟隨者缺乏文化素養而不和他們提及他閱讀的嚴肅著作，對克萊恩應該沒有這樣的考慮。可是克萊恩不但從沒提到蔣經國閱讀的作品，也不曾提及在他和蔣經國長達四年的頻繁接觸以及後來二十多年的偶而接觸中，蔣經國曾經說出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和見解。

文化素養低落似乎是二十世紀獨裁者的共同特徵。希特勒的文化水平雖然比他的那些納粹頭子高，可是也並沒有高出多少。根據希特勒所寵愛的建築師史畢爾的回憶，納粹政權最高階的五十多位官員中，不到十個大學畢業；他們大多只讀完中學，而且知識淺薄得令人吃驚。這也是為何希特勒一直不讓他這些納粹頭子和軍事將領們共處社交場合的原因。希特勒深怕他的這些文化水準低落的跟隨者，被出身良好的職業軍人瞧不起。希特勒對建築抱有狂熱。當柏林被盟軍轟炸的時候，希特勒最關心的不是人民的生命和財產，而是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和歌劇院是否被摧毀。希特勒也喜歡華格納。有一次黨代表大會在紐倫堡舉行，慶祝活動中有一項是由柏林愛樂交響樂團表演華格納的歌劇。大約一千位出席的黨代表都收到請帖和免費入場券。可是當希特勒進入歌劇院大廳的時候，他發現整個大廳都是空的。希特勒認為這是對藝術家最大的侮辱，他因此命令他的衛兵將他的納粹高官們從啤酒屋、咖啡廳、以及其他見不得人的地方，強行拖到歌劇院乖乖地陪他觀

26 Wintrob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 348.

27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賞。希特勒雖然喜歡建築和華格納，一次大戰期間當兵時行囊所裝的雖然也是叔本華，可是希特勒的文化水平其實並沒有高出這些納粹份子多少。戰前他每天晚上的娛樂竟是觀賞院線的電影，看完之後還要對女明星品頭論足一番。²⁸ 像拿破崙那樣有自知之明、並且試圖努力提昇文化水平的獨裁者畢竟少見。成長於只有貴族階級才付得起教育的傳統社會中，農家出身的拿破崙自不可能有機會享受文化的薰陶。自知文化水平不高的拿破崙因此特意將來自法國最古老的貴族家庭，被公認為當時法國最優雅、最機智、最有文化品味的男人塔列宏（Talleyrand）帶在身邊，隨時向他學習舉止、風度、和品味。²⁹

俄共第一代的革命家經常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尤其是托洛斯基。事實上他們也都是一群文化粗鄙之徒；甚至托洛斯基對生命和文化也從沒有尊重過。列寧自稱曾在革命前某一個夏天，將當時一本充滿革命教條、非常無聊的政治小說《應該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讀了五次。這本書一般人五個夏天讀一次都會受不了，列寧不但一個夏天讀了五遍，而且說該書改變了他的一生，後來的革命小冊子更同樣的書名。列寧在革命後有一次寫信給俄國革命的文學守護神高爾基說，「這些二流的知識份子，他們自以為是民族的頭腦。他們不是民族的頭腦，他們是民族的大便。」³⁰ 和列寧比起來，粗暴的史達林反而比較能鑑賞知識份子的重要性，將他們視為「心靈的工程師」；而工程師的任務就是將一般人民的心靈，營造成對他的無限崇拜。所有的知識份子在完成其營造心靈的工程任務之後，當然都得一一消滅。唯一的例外是巴斯特那克。不過史達林卻是用另一種方式折磨巴斯特那克：迫使他的秘書愛人成為監視他、密報他的線民。《齊瓦哥醫生》的女主角「娜拉」就是以這位秘書愛人為範型。在這本如詩的小說中，理想主義既為野蠻政治完全摧毀，愛情成為人性最後的庇護所。只是在荒涼的現實政治中，愛情終究也無法苟存。隨之，人性和靈性也完全淪喪。如果在小說的想像世界中，

28 本節關於希特勒的敘述，都來自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29 Robert Greene, *The 48 Laws of Power* (New York: Joost Elffers, 1998), 81.

30 M. Armis, *Koba the Dread*, 15.

齊瓦哥醫生因為僅存的少許尊嚴而捨棄愛情、終究失去人性；在現實世界中，史達林的權力卻殘忍地摧殘巴斯特那克的愛情，而那卻是詩人的靈性得以在亂世中倖存的最後一個園地。

後來的俄共獨裁者布里茲涅夫在文化上和他的先輩同樣地粗鄙。布里茲涅夫統治俄國將近二十年。俄共的造神運動和偶像崇拜在其任內達到最高潮。在官方的宣傳中，他不但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政治家、睿智的軍事策略家、甚至是優秀的文學家、以及當代的卓越思想家之一。事實上，他可能一生中都沒讀過一本書。他最大的樂趣是打獵、開快車、看電視轉播曲棍球比賽。³¹

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似乎是獨裁者家族的唯一異類。曾任義共機關報總編輯的墨索里尼酷好讀書。即使在政權的危機時代，他的桌上都還放著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而且書中寫滿他的眉批。墨索里尼不但從不拒絕採訪，尤其喜歡和訪問者討論當代的政治和哲學理念。除了母語之外，他可以用三種語言接受訪問。他不但對本國新出版的文學和哲學作品保持密切注意，甚至經常親自寫信給作者，有時提出他的批評，有時則表達恭賀之意。³²

可是墨索里尼畢竟是例外。人類政治生活的悲劇之一是，不但必須經常被獨裁者統治，而且是被才智平庸、文化水平低落的獨裁者統治。在平民思想抬頭的二十世紀中，一個歷史諷刺是：保衛文明價值的政治領袖是貴族出身，如羅斯福和邱吉爾；而試圖摧毀文明和人性的卻是中下階級出身的希特勒和史達林。即使在民主社會中，政治權力的運作邏輯仍然有別於文化價值的運作邏輯。美國當代政治思想的一個主軸因此期待更佳的領導，以保障民主的品質。其對立的思想則是期待更堅強的民主公民。³³

蔣經國另一個個性上的特徵是冷酷。有一位法國記者曾經問過密特朗，政治領袖必須具備哪些條件。密特朗的回答只有一個字：「漠然」(indifference)。密特朗的想法和甘地有些類似。甘地認為政治人物不應該有

31 Michael Dobbs, *Down with Big Broth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5.

32 R. J. B. Bosworth, *Mussolini* (London: Arnold, 2002), 1.

33 Benjamin R. Barber, "Neither Leaders nor Followers: Citizenship under Strong Democracy," in *A Passion for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親密的朋友，否則會影響政治判斷。政治領袖爲了應付隨時在變化中的政治情勢，或許必須對朋友、同志、和敵人保持超然，甚至漠然。可是在私人感情上，蔣經國的漠然顯得幾近冷酷。他和章亞若以及章孝慈兄弟的關係，似乎就是這項個性的表現。章亞若到底如何死亡，一直眾說紛紜。根據當時蔣經國在贛南的舊部漆高儒的說法，當章亞若以「蔣夫人」的名義積極參加社交活動後，蔣經國的手下認爲，爲了蔣經國的政治前途，必須將之加以除去。執行這項任務的是蔣經國留俄的同學，特務黃中美。而蔣經國的反應呢？「蔣經國先生對這位戴墨鏡的人顯然很不滿意。」³⁴ 蔣經國對手下謀害一個無辜的女人、而且是鍾愛的情人的反應，居然只是「很不滿意」而已。黃中美執行私刑之前，其他手下提醒他此等大事必須三思，黃居然回答，「我會負責。」這些跡象讓我們很難相信這件謀殺案不是出自蔣經國的授意或同意。章亞若死後，蔣經國一生中從來沒有單獨接見過他的兩個親生兒子。在媒體受嚴厲控制、白色恐怖氣氛瀰漫的整整四十年間，和兒子見面而不洩漏消息並非難事。然而蔣經國從來沒有這樣做。他和親身子女的關係實在有異於常人。

羅馬時代的歷史學者普魯塔克（Plutarch）的《生命錄》（Lives）是古典時期最偉大的作品之一；³⁵ 美國的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稱呼它爲英雄的聖經。在這本十八、九世紀歐美政治菁英必讀的書中，普魯塔克討論並比較了五十位希臘羅馬時代的政治領袖。雖然其主要動機在於呈現這些政治領袖的偉大品質以供後人效法，可是也經常觸及人性的陰暗面、偉大成就對品格所構成的挑戰、以及因之而來的毀滅。其中之一就是「巨大權力對掌權者的品格所造成的變化—容易衝動、自以爲重要、以及缺乏人性。」那些掌握權力可是卻不失其純真的英雄人物，因此特別獲得他的激

34 漆高儒，《蔣經國評傳》，314-15。

35 本書一般譯爲「傳記」或「希臘羅馬名人傳」。事實上希臘文live的意義，除了是：「傳記」外也可以是「生命」。根據普魯塔克自稱，他要寫的並非一般的傳記，而是偉大政治家的生平和行動中，所透露出來的偉大品格。他在「亞歷山大和凱撒」的序言中說，「正如畫家畫一個人不會描繪身體所有的部分，而只是從臉孔和眼神中點出其內在品格」，其作品的目的也是在深入政治領袖的內在靈魂。」因此，我認爲譯爲《生命錄》或許較爲恰當。

賞。

當獨裁者因權力而逐漸遠離人性純真的時候，卻同時也對別人的熾烈人性懷著深沈的妒恨。和許多獨裁者一樣，蔣經國也喜歡對被他壓迫的人施予個人恩惠。這種行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傾向於認為，這種施恩行為其實是爲了屈辱反對者，而其動機則是上述的妒恨心理。例如殷海光過世後，他太太的出國申請一直不被核准，甚至有特務到她家勸他打消出國的意念。後來在雷震的指點下，殷太太寫信給蔣經國向他求情，才終於獲准出國。雷震以他在統治核心中多年的經驗告訴她，「你要出國，你一定要親自寫一封信給蔣經國。國民黨的作法就是這樣，希望你求他。你求他，他再放你，這樣他就很有面子。」³⁶ 雷震的解釋是統治者要「面子」。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則是：統治者要反對者以實際的行為明白承認，誰才是真正有權力的人，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這些動機或許都存在。不過最深沈的或許是（只是或許）對高尚人性的妒恨；那種高尚正是獨裁者在其跟隨者群中無法發現的。此種堅忍和高尚也是唯一對其權力無所懼的力量；因爲獨裁制度仰賴的基礎正是人性的脆弱面。面對此種人性中的高尚面，獨裁者或許也自慚形穢。從對反對者的施恩中，獨裁者摧毀了反對者在道德上的優勢。二次大戰前一位瑞士作家曾經深刻的描述過，獨裁者這種對不懼怕其權力者既羨慕又仇恨的心理。「獨裁者難道不嫉妒被壓迫者麼？這些受壓迫者被判刑、被丟到監獄中；他們被剝奪了曾經擁有的一切，他們雖然空無一物，可是卻擁有著堅強對抗國家無上權力的驕傲靈魂。」³⁷ 獨裁者深知，光是囚禁反對者、折磨反對者無法屈辱他們的靈魂；而且，折磨和處罰愈嚴厲，就愈能表現出反對者的道德堅忍和高尚。這正是獨裁者所不能忍受的。只有當反對者親自向他求情、或簽下悔過書、承諾書，獨裁者在道德上的忌恨才能得到抒解。

蔣經國對章亞若的方式，表現出他個性上的冷漠，同時也顯示他對法律

36 殷夏君璐，「記憶的蒼穹」，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 18 卷(台北：桂冠，1990)，524。

37 Robert de Traz, "Dictator and Dictatorship," ed., Otto Frost de Battaglia, Dictatorship on Trial (London: George G. Harrap, 1930), 164.

的態度。很多例子都顯示蔣經國並不是一個尊重法律和人權的政治人物。他的侍衛提到，總統府一位科長因為生活和行事風格都為蔣經國所不喜，不知何事觸怒蔣經國，竟莫名其妙地被警備總部關了半年。³⁸ 另一個為當時政壇眾所周知的例子是，曾任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的任顯群，因為娶了蔣經國追求的平劇名伶顧正秋而為蔣所報復，以「參加叛亂組織」為名將任逮捕入獄。顧正秋的回憶錄對這件事的敘述非常曖昧不明：結婚之前友人勸告他們，為了任的政治前途必須慎重考慮；結婚時，雖然顧正秋交往的對象俱為當時在朝的權貴（如徐柏園、周至柔、張道藩、黃杰、王叔銘、雷震等），仍然不敢公開舉行婚禮；然後是任顯群在獄中，以平劇戲碼《審頭刺湯》為暗語，要顧正秋學習劇中女主角雪豔，於成婚之夜刺殺為了搶奪女人而陷害忠良的湯勤。這些線索留給讀者太多的疑惑：何人有這樣大的權勢，不但將廣交權貴的顧正秋逼得連結婚都不敢公開，甚至讓這對夫婦不惜考慮在床上刺殺惡人以殉情的「慘烈結局」？³⁹ 如果對一般人可以如此不顧法律、不尊重人權，對挑戰其統治權威的反對者，他會採取何種行動也就不難預料了。稍後我們將討論蔣經國在臺灣幾個重大政治案件中的角色。

蔣經國最顯著的另一個個性是，不重生活享受。蔣經國自己也很自豪他沒有任何財產。這也是許多現代獨裁者共同的特徵之一。一般而言，和傳統的獨裁者相較，現代獨裁者的生活享受並不奢華。可是他們卻經常秘密累積巨大的財富。因為獨裁者雖然權力很大，卻懷有隨時可能被罷黜的不安全感。羅素到蘇聯訪問列寧的時候，對列寧生活的刻苦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列寧的秘書卻曾經偶然發現，列寧在克里姆林宮內存了大量的鑽石，準備萬一共產黨垮臺時逃亡之用。⁴⁰ 相較之下，蔣經國個人（非其家屬）並沒有累積太多的財富。部分原因來自他早年的困頓生活，部分原因或許來自他對自己統治的信心和安全感。

和其他的獨裁者相較，蔣經國的另一個在性格上最顯著的特性是喜歡到

38 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香港：利文出版社，1994），254。

39 顧正秋、季季，《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431。

40 Gordon Tullock, *Autocracy* (Dordrecht: Lluwer Academic Publication, 1987), 119.

民間去。當他處在他所統治的人民當中的時候，他所感到的快樂是每一個接近他的人都觀察到的現象。根據李敖的統計，「從1978到1981的四年間，蔣經國下鄉一九七次，『與民同樂』一五五天。」⁴¹ 平均一年下鄉五十次；平均幾乎每星期下鄉一次。歷史上大概很難找到在這方面足以和蔣經國匹敵的獨裁者。李敖將這種行為稱為「親民秀」，是蔣經國「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事實上，這也是幾乎所有對蔣經國的回憶和評述都非常強調、或刻意突出的重點。

獨裁政治的最大特徵之一確實是「偽裝的政治」。在獨裁政治中，不只統治者常常偽裝，他的跟隨者也經常被迫偽裝。羅馬時代的歷史學者塔基圖司（Tacitus）的著作，是古典時期對獨裁政治最豐富、最深刻的分析。後來的馬基維利、孟德斯鳩等對獨裁政治的分析都受到他不少的影響。盧梭和狄德羅喜歡塔基圖司，甚至親自翻譯他的著作。塔基圖司談到羅馬獨裁者尼祿的一個有趣的故事。尼祿喜歡音樂。當他演奏的時候，命令許多特務混在聽眾之中，觀察聽眾臉上的表情，記錄他們哪些人露出愉快欣賞的表情，哪些人顯露憎惡的表情。結果當然是皇帝的表演頗為成功，所有的聽眾都非常享受皇帝的演出並且賣力鼓掌。⁴² 這個故事當然比較極端。可是在獨裁政治中，跟隨者也經常須要偽裝，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獨裁政治將一國的人民都貶低為平庸的演員和偽裝者。李登輝在人群中曾經被襲擊潑墨水。此種惡質的行為當然不符合社會和民主政治的基本規範。可是和蔣經國的出巡相較，民眾不再須要做出拙劣的表演、心靈不再被扭曲，這或許是一個進步。

可是，蔣經國親民行為的動機應該不只是作秀而已。或許可以有兩個相關的動機來解釋這樣的行為。一個動機是結構性的、政治上的需要。另一個動機則是私人性的、心理上的需要。這樣的心理需求經常見於獨裁者。他的親民行為在滿足這兩個動機上，似乎都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結構性的政治需要，是由於他缺乏統治的合法性，因此必須創造群眾的支持。特別是由於蔣經國的權力來自繼承父親，而非如其他獨裁者如佛朗

41 李敖，《論定蔣經國》（台北：李敖出版社，1989），22。

42 Roger Boesche, *Theories of Tyranny*, 105.

哥、墨索里尼、希特勒等爲自己所創造。和其他的獨裁者相較，蔣經國之所以掌握權力並非因爲自身的努力和對政治的「貢獻」。因此他必須更努力地創造人民的支持和統治的合法性。獨裁政治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一是創造物質利益來爭取人民的支持。在現代社會是透過經濟發展，在古羅馬時代則是提供娛樂。另一項工作則是創造合法性。社會主義獨裁政權有一套自成系統的複雜意識型態，來提供合法性。可是反共的威權獨裁政權，一般而言都缺乏可以爲其獨裁統治辯護的意識型態。⁴³這也是爲何右派的佛朗哥將軍，試圖用公民投票來合法化他的獨裁體制。公民投票之前，西班牙反對獨裁的政治人物都被禁止發言，反對他的政黨也被禁止活動。而法律則強制人民必須參加投票。結果當然可以預期：佛朗哥的獨裁體制獲得百分之九十三的人民的同意。⁴⁴

國民黨當然不可能用這種公民投票來合法化其獨裁體制。一方面，在法理上臺灣人民不能代表全中國人民做這樣的授權。另一方面，在憲政體制上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國民大會仍然沒有失去功能。統治的合法性和人民的支持既然無法透過制度加以創造，僅有的選擇就是透過政策（如經濟發展、勞工福利等）以及對個人喜愛的創造了。在政策上，除了土地改革嘉惠農民外，嘉惠勞工的勞工保險和勞動基準法都遠在勞工階級覺醒動員之前甚久就已經實施。這些勞工福利顯然不是階級動員的結果，而是獨裁統治者爲了創造政治支持的措施。除了政策外，身爲獨裁權力繼承者的蔣經國，創造人民對他的喜愛似乎是另一個必要的政治工作。

可是統治合法性的需要應不是唯一動機。另外的動機應來自獨裁者的心理需求。他的日記中，充滿了在民間受到民眾歡迎的喜悅。

適逢廟會，群眾雲集，皆以親切和熱烈的笑容迎我…

有一山地小孩…自編白色鮮花來送給我…有一值日老兵見我，一時不

43 J. Juan Linz, "Authoritarianism and Totalitarianism," ed.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Macro Political Theory,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 1975).

44 Sheelagh Ellwood, *Franco: Profiles in Power* (London: Longman, 2000), 150.

知所措，湧出熱淚雙行…一家人一定要送給我蓮霧兩籃，且堅持不肯收錢…一定要送我放在車後之飯瓜四枚，其情至切…路人皆向我歡笑握手，親切可感。

到達成功大學時，被學生包圍簽名，握手問好…此一情形給我很大鼓勵。有一老農民又送我蛤蜊，其情至為誠懇…上碼頭時，又被人群包圍歡呼，余深為感動，含淚上車。

一進門即受到受刑者之笑面歡迎，鼓掌問好…當我出大門時，兒童呼喚之聲，尚存在耳中，怎不令人感動。

有個二、三歲小孩，跑過來要我抱他，這是多麼動人和愉快之事。余被包圍於人群之中，至感親切。

有一農家八十六歲的老太太，手持蕉扇，要摸摸我的手，最使人感動。

他們發現我在山坡上，就像人潮一樣，向我湧來，問好、握手，一起攝影，情緒之自然和熱烈，令人感動非常。

受到數千群眾歡迎，甚為他們的熱情所感動。」「和民眾在一起，談話歡聚，乃是我所要追求的樂處。⁴⁵

正如蔣經國自己所說的，在和民眾一起的時候，他從民眾對他的歡迎中獲得不少的樂趣和「感動」——一個經常出現的心情描述。為什麼呢？瑞士作家特拉茲如此深入而獨特地分析獨裁者的心理：「獨裁者真的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以無比的歡愉之情享受他的權力嗎？當意志不再有任何反抗的對手，它將失去熱情，也將失去更新其力量的慾望。獨裁者知道，所有的人對他不是說謊就是保持緘默。他已經不再能分辨，他周遭那些人的眼睛所閃爍的光芒，到底是出於效忠還是出於諂媚。他鄙視周圍的人，因為他們過度奉承；他不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所求於他的只是金錢和職位，而非領袖的善行。他也非常明白，只要命運之神稍微變心，這些人隨時會遺棄他、背叛他。」⁴⁶

45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

46 de Traz, "Dictator and Dictatorship", 164.

獨裁者的心裡非常明白，他的跟隨者所要的只是物質利益；而獨裁者（或每一個政治領袖）需要的，卻是真誠的愛戴。莫斯科的地下鐵和美輪美奐的車站，是俄共向人民交出的一張重要成績單。剛通車的時候，整個統治集團興奮莫名。有一天，史達林在安全措施準備不及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和幾位興奮的俄共高層人士去試乘。當史達林到達地下鐵車站的時候，受到人民狂熱的歡迎。「儘管他十分清醒，人民對自己領袖的那份熱愛還是感動了他。此情此景未經任何準備，沒有形式主義的東西。」⁴⁷ 受到人民如此熱烈的歡迎，那些沒有經過選票肯定的獨裁者，焉能不被感動。

事實上，不只是獨裁者，任何政治領袖在內心深處都渴求人民的真心擁護。柯林頓總統競選連任的時候，由於幾乎篤定當選，他的競選經理於是取消了許多和民眾親密接觸握手寒暄的場次，以節省體力和花費。可是柯林頓卻堅持要恢復這些活動；他對助理說，「拜託，這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機會了！」我個人也曾經目睹民眾的真心愛戴，可能帶給政治人物何種程度的感動。多年前，我陪一位離鄉近十年的反對派政治人物回到他的家鄉遊街。許多民眾見到他，不只還記得他，甚至放下手邊的工作和他握手。民眾自動自發的熱情，確實帶給他甚大的感動。途中一位賣魚的中年婦人看到他，首先是訝異，然後馬上放下工作匆匆擦拭滿是魚鱗和魚內臟的雙手，熱切地趨前和他握手。她匆忙的動作、興奮又羞澀的表情，讓你無法不感覺到她的熱切和真誠。感動讓這位政治人物捧起她滿是魚腥味的雙手，俯頭親吻。這是我所看過民眾和政治人物之間最激情的交流。

每一個政治人物都渴求民眾的肯定。民主政體中的政治領袖可以透過民主選舉和民意調查，知道民眾對他們的評價。可是獨裁政治中，卻缺乏這樣的機制，讓最高領袖得以從中獲得自我實現和對自身的肯定。這正是獨裁者最大的矛盾之一。一方面，較諸民主的政治領袖，他有更高、更專斷的權力。可是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他具有無上的權力、正因為試圖和他競爭人民支持的人都被他關進了監牢，他因而無法確知被他統治的人民到底是不是擁

47 Edvard Radzinskii,《斯達林密聞》(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7), 370.

護他。⁴⁸或許蔣經國比其他獨裁者更實際的地方是，他清楚知道：官方的宣傳、大眾媒體的擁戴、跟隨者的諂媚、學者的奉承，都不能過份相信。他須要從和民眾的親身接觸中獲得人民的肯定。這或許是蔣經國那麼喜歡和人民接觸的更大動機。他和人民的頻繁接觸，固然滿足了他的心理需求，卻同時也帶來人民的愛戴。幾乎所有懷念蔣經國的文章都會提及這點。他的「親民」同時也是其之所以獲得正面評價的最重要基礎之一。

民主主義者蔣經國

欲解釋蔣經國在臺灣民主化中的角色、評價其對臺灣民主改革的貢獻，我們或許必須先了解蔣經國的政治理念。他身為實際的政治領袖長達數十年。如果他在這長久過程中顯示出是一個具有民主信念的領袖，那麼他後來的民主改革就顯得非常一致而容易理解。如果他先前長達數十年的統治中，充滿了對民主的壓制、對人權的蔑視，那麼他後來的民主改革就須要另一種解釋。而對民主的壓制、對人權的蔑視，正是他長久統治的特徵之一。

前文曾經提及，蔣介石自從1950年代開始，就已經不太管事了。從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早期，蔣經國其實就是實際統治者。在他統治的近三十多年間，也正好是臺灣政治最恐怖的時期。根據官方宣布的數字，從1949到1987年間，臺灣總共有29,404名政治犯。而根據他的左右手、軍中政戰系統的長年負責人王昇的估計，這近三萬名政治犯中約有百分之十五（四千多人）遭到槍斃。⁴⁹這是在他統治下的一般政治壓制。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從他在幾個重大政治案件中的角色，看出蔣經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為的傾向。

這些政治案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1960年雷震的「自由中國組黨運動」。該事件在臺灣的民主發展史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首先，它是第一次組織反對

48 Wintrob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 335-36.

49 陶涵，《蔣經國傳》，230。

黨的嘗試。其次，或許是更重要的，它是外省籍和本省籍政治人物的結合。這在族群關係上有重大的意義。如果該組黨運動不被壓制，臺灣今天的族群關係或許會有很大的不同。⁵⁰ 當時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陳誠似乎是傾向接受的態度。他說，「只要不是軍閥、地痞、流氓的政黨」就可以成立。⁵¹ 可是日後被學術界尊奉為民主改革者的蔣經國，卻在蔣介石試圖以高價收購《自由中國》雜誌、並任命雷震為駐日大使為後者所拒後，力主強力加以鎮壓。根據一位參與處理雷震事件之行動專案「兩田專案」的高階將領之日記，「蔣副秘書長〔經國〕主持會議…對雷傲寰近來的言論表示不滿，認為他的言論就是過去『民盟』與匪黨叛國行動的勾結。」「蔣副秘書長主持情治座談…指示，對於雷震之《自由中國》煽動言論，軍中與學校受其影響很大，各單位黨員同志，應即採取處置。尤其雷震反對總裁連任，無視黨國存在，表示雷震與匪黨勾結行動已經違法，各單位應提出步驟與辦法，解決問題。」⁵²

雷震在日記中亦曾記載蔣經國對其改革行動的負面態度。雷震於1951年參加忠烈祠的公祭時，遇到蔣經國。後者當著雷震的面，說他主張軍隊退出黨部，是「受了共產黨的唆使，這是最反動的思想…你們這批人，本黨不知吃了多少虧，今日仍不覺悟，想來危害本黨。」蔣經國「態度如此無禮貌，出言如此不擇詞句，令人非常難過。」⁵³ 根據雷震夫人宋英所述，雷震當晚和她說起此事，淚流滿面，氣呼呼的說，「蔣經國這小子真可惡，去年還叫我雷伯伯的，今天居然敢用這種態度對我。」⁵⁴ 也難怪雷震生氣，他曾經是蔣介石的首要幕僚，在國民黨內的輩份和地位都遠在蔣經國之上。不過，從這裡也可看出蔣經國的個性。

雷震被捕後，當時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在回覆國務院詢問該案的電文中指出，蔣介石逮捕雷震「據總統府秘書長所言，是來自情治單位的敦促。而

50 吳乃德，「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第四期（2002/12）：75-118。

51 陶涵，《蔣經國傳》，283。

52 張友驊，「兩田專案：組不組黨都抓？」《自立晚報》1998/7/30。

53 《雷震日記》，雷震全集，第33冊（台北：桂冠，1989），70。

54 馬之驢，《雷震與蔣介石》（台北：自立晚報，1993），55。

蔣經國在讓其父親做出這項決定中，可能有積極的角色。」⁵⁵ 根據柏楊的說法，「1960 的某一天，蔣經國和他的家人去碧潭游泳，從他溫暖的笑容中可以看出他心情的愉快…當初史達林先生下令逮捕托洛斯基元帥時，他也去黑海游泳，露出同樣的笑容…就在當天，蔣經國下令逮捕雷震和傅正。」⁵⁶ 1971 年的李敖、謝聰敏、魏廷朝案也是由蔣經國下令逮捕。⁵⁷ 除了為保護他和他的父親的獨裁地位而壓制要求民主的異議份子外，蔣經國也經常因為政治鬥爭而將他的競爭者逮捕監禁。在和周至柔的政治鬥爭中，蔣經國將周之智囊大華晚報董事長、中廣副總經理李荊蓀，以匪諜名義逮捕，判刑 15 年。⁵⁸

除了以逮捕監禁的方式鎮壓反對者之外，蔣經國和幾個重大的政治謀殺案件其實也很難脫離關係。例如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當時被逮捕的黨外運動領袖的房子，全部置於情治人員二十四小時的監視之下。林義雄家自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而且是在白天，竟然可以發生這樣的案子。血案發生之後，情治系統沒有人受到懲罰。這很難不令人懷疑為政府的情治系統所為，而且指令來自相當高的層級。

另外，江南刺殺案和蔣經國的關係則更為接近。根據臺灣最大幫派竹聯幫幫主陳啓禮的證言，當他在美國完成刺殺《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回到臺灣後，情報局局長汪希苓在辦公室接待他，並當場打電話向總統府報告。「汪希苓打電話時，不但立正站好，而且非常恭謹。能讓一位權勢燻天的情報局長以那種語調和姿勢接電話的，除了『蔣總統』之外，不可能有別人。」⁵⁹

從蔣經國對人權和生命的輕忽、他在威權獨裁體制中的長久地位、以及他在幾個重大政治壓迫事件中的角色看來，他很難說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可是在討論臺灣民主化的著作中，一個普遍受歡迎的論點卻是：蔣經國在臺灣民主化中扮演了一個關鍵性推動者，甚至是「發動者」(initiator)，的角色。

5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 354,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19:725.

56 周碧瑟，《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1996)，235。

57 周碧瑟，《柏楊回憶錄》，336。

58 周碧瑟，《柏楊回憶錄》，295-297。

59 劉益宏，《江湖一本正經》(台北：時報出版社，2002)，39。

⁶⁰ 除了學術著作外，許多知名學者的政論也都有相同的看法。例如余英時指出，「我們…不能不承認蔣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執政黨確實表現了『天下為公』的誠意。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壓力當然都對國民黨的最近動向發生了影響。但是國民黨和蔣先生的主動精神也絕不容忽視。我覺得這是理解今後臺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⁶¹ 可是蔣經國對「自由中國」和「美麗島」兩次民主運動的鎮壓，在這篇文章中都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金耀基也認為，「孫中山的憲政理念，顯然成爲了臺灣黨國領袖群，特別是蔣經國的終極的價值規範。」⁶² 基於這樣的認知，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認爲臺灣民主化是蔣經國由上而下的推動。同樣的，此文也完全不提蔣經國先前在美麗島事件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好像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⁶³

對民主主義者壓迫民主運動的可能解釋是：蔣經國確實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可是爲了國家更大的福祉，他不得不壓制民主運動、逮捕反對派、有時甚至槍斃他們。做出此種解釋的是美國作家陶涵。他在中國時報負責人、早年曾爲蔣經國幹部的余紀忠所資助撰寫的《蔣經國傳》中說，蔣經國「決定大舉鎮壓〔美麗島運動〕，一則是要在國民黨內維持團結一致，也是因爲他覺得若非如此，可能會滋生更多的暴亂，以致改革的進程失控。」⁶⁴ 也就是說，蔣經國鎮壓民主運動乃是爲了推動民主改革。雖然陶涵隨後也自我質疑，如果蔣經國真的是民主主義者，那麼他應該在其父親過世之後，立即就

60 做這種論斷的作品包括 Steve Tsang, "Transforming a Party State into a Democracy," ed. S. Tsang and Hung-mao Tien,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Linda Chao, and Ramon H. Myers, *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Yangsun Chou, and Andrew J.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27,3 (1987):277-99; Yun-han Chu,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1992).

61 余英時，「急不得也緩不得」，《民主與兩岸動向》（台北：三民書局，1993），2。

62 金耀基，「中國政治傳統與民主轉化」，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出版社，1992，123。

63 Ambrose C. Y. King, "A Nonparadigmatic Search for Democracy in a Post-Confucian Culture: the Case of Taiwan, R.O.C.," ed. Larry Diamon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3).

64 陶涵，《蔣經國傳》，389。

推動民主改革。然而他同時卻又以贊同的語氣引用蔣經國跟隨者的辯護，說此舉可能「激發軍方或右派的政變，也可能發生內戰，」（在當時可能發生內戰，實在匪夷所思），也「可能由臺獨人士當選，可能激惱中國而發生戰爭和民間衝突」。⁶⁵ 隨後作者終於不再對蔣經國的民主性格猶疑不決，而很確定地說，「至少從 60 年代末期起，蔣經國和它的政治班底已承諾要奉行真正多元的民主政治理念。他們的改革已經不是只求減緩壓力的策略。」可是從 60 年代末期開始，我們經歷的卻是白色恐怖的氣氛和一連串對民主運動者和反對言論的無情鎮壓。

蔣經國對民主的貢獻

如果蔣經國的民主改革措施並非因為他的政治信念，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對政治形勢所做的回應。當我們解釋臺灣民主化的時候，最重要的或許是分析和回答：什麼樣的政治形勢，迫使、或誘導獨裁的威權政權做出民主妥協？在討論政治形勢的時候，許多解釋臺灣民主化的著作都提及美國的壓力。⁶⁶ 事實上，正如 Huntington 指出的，「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共同因素之一是國外（包括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壓力。⁶⁷ 由於經濟上對美國市場的需求，更由於軍事上對美國的依賴，美國對臺灣的影響力不言可喻。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民主化決定，必然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而且正如這些著作所強調的，江南謀殺案暴露之後，美國對國民黨的壓力更為巨大。「自由中國」案的壓力僅止於美國的國會部門。上面所引述的美國大使關於雷震案回給國務院的電文中，建議美國政府對該案採取「耐心」的態度，不要做出任何負面的反應。因為以當時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的反

65 前引書，476。

66 Steven Hood,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77; Wu, Jaushieh Joseph, 1995,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0.

67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85-100.

感，國民黨的政權很難在政治開放的局面下維持穩固。而國民黨的安定卻是美國利益之所在。可是美麗島事件和江南命案後，美國的壓力已不只是國會決議不得出售武器給臺灣，除非它停止壓制人權了。壓力已經擴大到美國的行政部門。這些都是事實。

可是除了美國的壓力之外，更重要的或許是來自人民的壓力。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歷史上看統治者／統治團體面對挑戰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壓制反對者，不論是英國的貴族政權對中產階級的民主運動，還是美國白人政權對黑人人權運動，以及所有威權獨裁政權面對反對運動的挑戰。當獨裁者無法壓制反對者的時候，他只好採取妥協的態度。這解釋了「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美麗島」民主運動的成功。當「自由中國」被壓制之後，民主運動沈寂了將近20年。可是「美麗島」被壓制，卻演變成對政權更大的挑戰。

當壓制無效而造成更大的反抗的時候，獨裁者面臨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以更強大的力量、更嚴酷的方式繼續壓制反對者。這樣的作法可能真正壓制了反對者，而讓政權取得短暫的安定。可是也可能造成更大的挑戰、對立、和衝突，甚至危及政權的生存。正如英國的貴族統治團體在以武力鎮壓中產階級的民主改革運動無效之後，當時開明派領袖Gray首相對國王所言，「我個人相信公共輿論對這項問題的意見是如此的強烈和普遍，如果我們繼續抗拒它，我們將會讓政府陷入失去所有權威和力量的險境。」⁶⁸ 面對壓制無效，獨裁者可以有的第二個選擇是做出妥協，甚至主動規劃民主改革的日程表，以和反對派競爭民眾的支持。這是比較有智慧的選擇。也正是蔣經國所做的選擇。事實上，蔣經國也是在美麗島事件的鎮壓後，發現逮捕反對者不但無法壓碎民主運動，反而創造更多的反對者，他才開始以溝通代替恫嚇，授權國民黨高階人員和反對者展開「溝通」。美麗島事件之前，雙方雖有機會（在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班立德家中）接觸，可是卻只是非正式接觸，並沒有

68 G. Bingham Powell Jr., "Incremental Democratization: The British Reform Act of 1832," ed. Gabriel A. Almond, Scott C. Flanagan, and Robert J. Mundt, *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 140.

來自蔣經國的授權。⁶⁹

因此，蔣經國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在美國和人民的壓力，這兩個他完全無法掌握的雙重壓力下，被迫採取的決定。當然，蔣經國當時也可以不理會這些壓力，繼續壓制民主改革運動，從而在國外失去美國的支持，在國內則面臨人民更大的挑戰。在此種內憂外患下，國民黨政權將面臨中共革命以來最大的危機。蔣經國當然也可以這麼做。事實上，歷史上也有不少獨裁者這麼做；結果是失去整個政權。蔣經國並沒有這麼做。此種識時務、願意和不可扭轉的歷史趨勢妥協的能力，是他政治智慧的表現。雖然他和大多數的獨裁者一樣，缺乏文化素養、摧殘人權、不尊重生命，可是當形勢比人強的時候，他願意屈服。他的屈服，讓臺灣的民主轉型得以在平靜的過程中完成。雖然他和現代型的獨裁者一樣，不重生活享受、隨時密切注意人民的反應，可是他從來就不是民主主義者。他對臺灣民主的貢獻，並非眾多學者所說的是「推動者」。他的貢獻，是他自動移開了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獨裁。這是他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而且是唯一的貢獻。

對他的繼任者李登輝的評價，我們也應該提出相同的問題：是歷史 / 結構的迫使，還是個人的自動選擇？在何種程度上，改革是來自歷史趨勢的力量，還是領導者個人的抉擇？一位學者這樣評價李登輝：「我們固然不必標舉偉人史觀、否定時空環境的制約，但也絕不能忽略李登輝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臺灣民主化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李登輝〕不但具備民主的信念，更能以務實的態度和靈活的策略推動政治改革。關鍵的是，他具備了駕馭民主改革所需的關鍵能力，包括善於設定議題，形成聯盟，動員群眾，選擇行動的時機，運用體制內的資源，操作正當性的論述，以及在交錯的多重矛盾中前進。」⁷⁰ 在學者的文章中一般甚少看到，此種對仍活躍於政壇的政治領袖所做的如此恭維和評價。在李登輝時代，本省籍的學者對李登輝的尊崇，和蔣經國時代外省籍學者對蔣經國的尊崇，恰成鮮明的對比。

69 梁肅戎，《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台北：天下文化，1995），207-221。

70 林佳龍，「政治領導與民主化：論李登輝的改革策略與成果」，台灣綜合研究院主辦，李

我們當然無法否認，政治領袖個人的視野和意志，在歷史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有些政治領袖在無法阻擋的歷史趨勢下，事先啟動、甚至加速了歷史轉變，如蘇聯的戈巴契夫和南非的戴克拉克。⁷¹ 可是即使如此，當臺灣在蔣經國時代已經跨過民主化的重要關卡，如組織反對黨的權利和媒體自由等，民主化已經成爲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的時候，乘勢而行的李登輝，能否被稱爲民主的推動者、或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是可以質疑、也應該質疑的問題。因爲問題的答案不只涉及歷史的真實，也涉及臺灣人民如何看待自己

總統主政 12 年與台灣的成就研討會，台北，2000/5/18.

71 南非、波蘭、蘇聯、英國工黨、西班牙等政治領袖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參見 Martin Westlake, *Leaders of Transition* (N.Y.: St. Martin's, 2000)。